

楊海明詞學文集

楊海明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第四册】
唐宋词论稿（续编）（卷五）

【第四册】 卷五 唐宋词论稿（续编）

楊海明詞學文集



楊海明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论稿:续编/杨海明著.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10
(杨海明词学文集;4)
ISBN 978-7-81130-188-5

I. ①唐… II. ①杨…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②宋词—文学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788 号

杨海明词学文集(第四册)
唐宋词论稿(续编)(卷五)

著 者/杨海明
责任编辑/潘 安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0890
传 真/0511-84446464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393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188-5
定 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总序

自1978年秋师从唐圭璋先生攻治词学至今,忽忽已过30年矣。回首当年,自己本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不意在攻读唐师的硕士研究生、随后又转入高校(苏州大学)工作之后,竟涂鸦出了一大堆评说唐宋词的文字,并在词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我的博士生们现今要为我策划出版这套词学文集,不禁感慨良多。我深知自己既缺乏像夏承焘、唐圭璋等老辈学人那样深厚宽博的学养,也跟不上新时期所涌现出的青年学者那种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迅猛步伐,充其量只是一个衔接两代的过渡性人物,因此要出文集,不免有些汗颜。但转而一想,对我来说,这套文集所收的旧文好歹记录着自己在词学研究领域里跋涉过的一连串足迹,把它们整理出来总算做了一番“盘点清理”和“立此存照”的工作,未尝没有一点意义;而对不少读者,尤其是很多青年学子来说,像《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唐宋词纵横谈》、《唐宋词美学》等旧书,由于后来未曾再版过,故在书店难以寻获,因此这次“打包”再版,也可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同意了门生们的建议,由他们分工协作对旧稿作了一定的校订,终于推出了这套词学文集。宋人陈与义曾有词云:“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临江仙》)对我而言,若是改动其中一个字,变成“三十余年如一梦……”,便很能表达此时看到这套文集的内心感受:往事早如云烟,此身也已垂暮;这套文集所收的旧文其优劣、良莠就让读者和后人去评说吧。而我本人则要闲登小阁去享受那为时有限的余生了。

本文集共八册、十二卷。下面,分别对各册内容作具体说明。

第一册由卷一、卷二组成。

卷一《唐宋词风格论》：此卷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后来发现，台湾木铎出版社 1987 年盗印过它，易名为《唐宋词的风格学》，且隐去了作者的姓名。韩国新雅社 1994 年将其译成韩文出版，翻译者为李钟振教授。

卷二《张炎词研究》：此卷原由齐鲁书社 1989 年出版。

第二册收录卷三《唐宋词史》。此卷原由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再版。后者对前者略作修订，主要是改正了一些错字和删除了某些不必要加的引号，内容基本不变。此次再版，依照后一版本。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6 年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韩国新雅社 1995 年将它译成韩文出版，翻译者为宋龙准、柳种睦先生。

第三册收录卷四《唐宋词论稿》。此卷原由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其中选录了我自 1981 年至 1986 年间发表的论文 32 篇。

第四册收录卷五《唐宋词论稿（续编）》。此卷为这次所新编的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35 篇，其时间跨度较大（1984 年—2008 年），主要是从《唐宋词论稿》出版以后所陆续发表的论文中选辑而成。其中内容大致分成六类：一是对唐宋词的魅力来源，尤其是其人生意蕴作出探寻；二是对唐宋词的心理内涵作些剖析，兼论“角色转换”对这些意蕴生成的重要作用；三是词论研究，以及我对于词学研究的若干思索；四是从传承和变异的角度来对唐宋词进行文化考察；五是读唐宋词的一些心得，它们所涉及的问题较多；六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文章，其中既有两篇论宋人散文的文章，还有三篇论析夏承焘先生治学历程和回忆唐圭璋、段熙仲先生往事的文章，收录这后三篇主要想借此表达对先贤的缅怀之情。上述 35 篇文章，以前散见于各种报刊之上，此次结集出版，可省读者查检之劳，姑取名为《唐宋词论稿（续编）》。

第五册收录卷六《唐宋词美学》。此卷原由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第六册由卷七、卷八、卷九、卷一〇组成。

卷七《唐宋词纵横谈》：此卷原由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5 年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易名为《唐宋词主题探索》。

卷八《宋词趣谈》：此卷原由台湾业强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它的学术性不强，但趣味性和可读性尚可，因大陆读者不易读到，故在此再版，可供非专业的读者阅读消遣。



卷九《李璟·李煜》:此卷原由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为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中的一种。

卷一〇《东吴绛帐履痕——序跋选录》:此卷收录了我为学生们的学术著作写的序跋。

第七册收录卷一一《唐宋词与人生》。此卷原由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第八册由卷一二、附录组成:

卷一二《宋词三百首新注》:此卷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合作者刘文华女士乃是我的妻子,不幸已于近时病逝。几十年来,她在生活和工作上助我良多。今日再版此卷,也作为对她的一种悼念。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据此重排,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易名为《宋词三百首鉴赏》。

《附录》四种:一是崔海正教授所写的《论唐宋词专家杨海明——当代词学家系列研究之一》。二是曹辛华博士所写的《杨海明与唐宋词研究的深化》。这两篇文章的撰写,其作者事前事后都未与我本人作过沟通,完全是他们个人意见的表述。照我看来,其中颇多溢美之词而缺少中肯的批评,实在愧不敢当。但它们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我的某些研究“特色”,可供我自己反省并供读者参考。而除此之外,很多师友(如曹济平先生、潘树广先生以及刘扬忠、肖瑞峰、王兆鹏、刘尊明等先生)和学生(如邓红梅、赵梅、闵定庆、钱锡生、王晓骊等博士以及浙江大学的张锦同学)也曾为我的一些论著写过书评,但因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再收录,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歉意!三是王晓骊博士所记录的《背靠遗产 面向当代——杨海明教授词学访谈录》,它概述了我从事词学研究的历程以及研究唐宋词的若干心得体会,也可提供给读者阅读。四是张幼良博士所撰《瞬间三十年——杨海明先生学术年表》。

正如开头所说,我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内竟不意涂鸦出了一大堆评说唐宋词的文字,其间的甘苦辛甜,自然一言难尽;而文章的优劣良莠,也心知肚明。总的来说,由于我的写作往往率性而发,主要凭兴趣和“感悟”,而不耐作缜密细致的思考,因此文章中的疏漏和缺陷(甚至错误)自然难免,还望读者多多指教!另外,由于我往往是先写成一篇篇单篇论文,以后又把这些论文中的观点和材料融汇在后来的专著中间;而在撰写单篇论文时,因每篇文章都要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故而有一些观点和例证有可能会在全书中多次出现,或许会令人产生

啰唆重复之感。这里谨表歉意。再者,由于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早期的文章并不像现今那样讲求“学术规范”,故而现在读来肯定不够“规范”,不够严谨。这点也请读者鉴谅!追昔抚今,如果说这套文集所收的一些旧文,在“文革”结束不久、新时期刚刚开始阶段或许曾有某些“闪光点”使人眼目为之一亮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恐就早已平淡无奇,甚至黯然失色了。所以我十分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新旧时期转型阶段的一位“过渡型”的研究者,而词学研究的崭新局面和崭新气象则期待着后来者们去努力开启和努力创造——这也是我作为一名曾经的词学研究者所殷切期望的。

最后,要对引导我走上研究道路并给我以提携指导的唐圭璋师、孙望师、段熙仲师、吴调公师表示深切的悼念与感谢;对大力促成本文集出版并付出辛勤劳动的我的博士生们(曹辛华、曹志平、孙虹、薛玉坤等)表示深深的谢意,拙著引文均由他们重新查核,并详为注出;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陈国安博士在本文集的出版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热情与认真令我十分感动,特在此也表示郑重的感谢;对大力资助本文集出版的江苏海门市教育局副局长许新海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支持本文集出版并花费很多心血的江苏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芮月英女史和图书编辑部主任顾正彤女史表示深深的敬谢之心。

杨海明
2010年10月



目 录

总序 / 001

【卷五 唐宋词论稿(续编)】

试论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 / 003

唐宋词的魅力来源与当代意义 / 016

试论普通读者对唐宋词的阅读欣赏活动 / 022

残菊飘零满地金

——试论唐宋词中有益于今人的思想养料 / 034

唐宋词所展现的心灵世界 / 046

爱情意识与忧患意识的“交互”和“交替”

——论晚唐五代词兼及两宋词的“主思潮” / 056

论唐宋词的“享乐意识” / 066

从“享受人生”看唐宋词人个体价值的“升值” / 079

试论宋代词人享乐心理的雅俗分趋

——以柳永、苏轼为例 / 088

“角色转换”与唐宋词之人生意蕴 / 096

角色转换与“词为艳科” / 108

宋代词论研究 / 116

论《词源》的论词主旨

——兼论南宋后期的词学风尚 / 137

一部优秀的唐宋词选

——介绍黄昇的《花庵词选》 / 148

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 / 152

词学研究之展望

——对今后开展词学研究的管见 / 168

关于词学研究的若干随想 / 181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 190

略论晚唐五代词对正统文化的背离和修补 / 199

“归心正似三春草”

——略论苏轼词中的“怀归”意蕴 / 210

试论唐宋词中“归家”意蕴对前代作品的传承与变异 / 218

试论宋词所带有的“南方文学”特色 / 226

试论唐宋词中名句的生成奥秘及其他 / 238

“妙在得于妇人”

——论歌妓对唐宋词的作用 / 247

诗词有别

——城市经济带给词的印记 / 255

论宋词发展史中的“雅”“俗”之辨 / 264

略谈宋亡前后的“政治批判词” / 274

宋代元宵词漫谈 / 283

浅谈宋代戏谑词 / 292

试论南唐中主李璟的词 / 299

《岳阳楼记》是“传道”之文 / 307

论周密散文的思想倾向 / 311

夏承焘先生在艰辛环境下的勤奋治学

——读《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三册) / 320

回忆唐老二三事 / 327

回忆段熙仲教授 / 330



试论人生意蕴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

一

在老祖宗所留下的全部文学遗产中间,唐宋词对现当代读者来说,堪称最具“活性效应”的作品之一。例如随便走进哪家书店(甚至是以出售言情、武侠小说为主的小书铺),你就准会看见各式各样的唐宋词选本,以及多家出版社编写的《唐宋词鉴赏辞典》。而若有机会读到青年学生热恋时所写的“两地书”,其中也差不多全会引用下面这些几近烂熟的宋词名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就说明,社会虽已进入以电脑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然而古老的唐宋词却至今存活在人们的心中。再如,曾经一度风靡过大陆的台湾女作家琼瑶的众多言情小说和影视作品,其中又有很多即取名于唐宋词的名句名篇:如《庭院深深》之取名于冯延巳的“庭院深深深几许”,《心有千千结》之取名于张先的“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一帘幽梦》之取名于秦观的“夜月一帘幽梦”,《烟锁重楼》之取名于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寒烟翠》之取名于范仲淹的“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种情况,绝非偶然,一则说明她对唐宋词的情有独钟,二则也表明了 she 有意用唐宋词的魅力来“招徕”读者。事实上,以词中名句来作点睛之笔着实使其作品平添了顾盼自怜的“姿色”。无独有偶,大陆的文艺作品也曾这样做过。如贾平凹的小说《山月不知心里事》,宗璞的散文《丁香结》,张瑜、陈道明等主演的电视剧《梦断秦楼》,还有那新中国成立前就家喻户晓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它们也都选用了唐宋词句作为篇名。究其用心,或者是作者曾从词中获取过创作的灵感和启示,或者又是想借助于词的“名句效应”来吸引读者和观众的注意。而仅以取名这一狭窄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足以窥见当代作家对唐宋词的熟悉和喜爱了。所以综合以上情况可知,尽管星移斗转,换了人世,唐宋词却仍对现实的文化生活发挥着参与作用。

然而,以上所举其实还只是词的“活性效应”之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若往深层去看,则此种“活性效应”就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它对读者感情世界和心理气

质的影响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将视野拓宽来看。

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文人,全都是些读书人,故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哲学,乃至生活情趣、审美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读书而获得的。在他们所读的众多书籍中,自然以儒家经典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政史类著作最为重要,无数代人对这些著作的学习和传授,铸成了整个封建士大夫文人的群体文化人格。但除此之外,诗文作品对他们的影响却也不可小视。且以诗歌为例:撇开《诗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崇高地位不论,就拿《离骚》、陶诗、杜诗这三类作品来说,它们就对封建社会的大量读书人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屈子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曾经激起过千百年来与他有着相似命运的士人之强烈共鸣;陶渊明的几首《归园田居》和一篇《归去来兮辞》(可以看作今之散文诗),又引动了他们多么深浓的归隐情趣;而一部被人称为“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诗集,竟又被囚禁在元朝狱中誓不屈服的文天祥读得烂熟,并一口气地衍生了二百首《集杜诗》。这就说明,正统的诗文作品,曾在凝铸和塑造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思想性格与文化心理方面,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旧时代的广大平民百姓来说,由于他们读书机会较少和文化程度不高,其接受的文学影响,主要不是来源于高雅的散文和诗歌,而是来源于比较通俗的戏曲和小说。这里且以小说为例,昔年梁启超就曾有过论述:“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海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戮贩卒、姬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①虽则其言明显有所偏颇(一是只看到小说“含有毒性”的一面,二是把上述陈腐观念的成因统统归罪于小说),但它确实相当犀利地揭示了小说对于“人心”、“人格”形成的重要熏染作用(因此他在此文中又大声疾呼:“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②。以此类推,则戏曲对于民众心里的影响亦复如此。如像“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才子佳人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9页。

② 同①。



式婚姻理想,“莫谓老天不长眼,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报应思想,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戏曲舞台而向广大民众传播的。由此可证,无论是高雅的士大夫群体还是普通的平民群体,他们都曾从文学作品中接受过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只是其接受来源和所产生的思想效应有所不同而已。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词对读者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是其影响面。首先应该承认,由于词为“小道末技”,所以它对士大夫文人的影响远不如诗文作品那样深刻,又因它比小说戏曲来得典雅,且缺少后两者的故事性和传奇性,所以它对平民百姓的影响也不如小说戏曲那样明显。但若换个角度来看,由于词体具有比诗文通俗而又比小说戏曲文雅的文体特色和文体优势,它就有可能同时获得雅、俗两大读者群的喜爱,故其影响力就几乎涵盖了全社会稍具文化知识的各色人等。

第二是其影响力的心理指向。由于小说戏曲之兴盛主要是在宋元以后,所以这里就仅将唐宋词和前代诗文作个比较。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据此,则诗歌和文史作品就对封建文人俨然具有着“教师”的资格与职责。不过,诗和文这两位“教师”却是相当严肃与正经的“男教师”,“他们”主要向学生们传授如何成为“士”和“君子”的大道理(虽然偶尔也会在课堂上发发个人的牢骚不平),故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就努力将读书人的心理气质导向“阳刚”的方向。如儒家先哲们就谆谆教诲后生学子:“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这样一来,读书士子自然只好收敛起他们内心固有的“阴柔”一面,而尽量使自己变得“刚毅”。但唐宋词(其主流作品自是婉约词)则显得大不相同了,她在总体上就扮演了一个“女教师”的角色(这正好吻合于德国哲学家谢林把诗歌称为“人类女教师”的比喻)。尽管唐宋词中也有类似于诗文那种士大夫文人的思想意趣(例如宋人就曾说过,读苏轼的《赤壁》词能“使人抵掌激昂而有击楫中流之心”,读苏轼的《哨遍》词,能“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种菊东篱之兴”(见《燕喜词叙》),但从整体和主流来说,则唐宋词就像一位温柔的女教师那样,给人以女性的体贴和关怀,教人懂得爱和柔情的可亲与可爱。故在她的抚慰和熏陶之下,读者的感情世界就可能变得更加丰富和细腻,其心理和气质也会产生变“柔”与变“俗”(世俗化)的趋向。当然,想要证明上述影响,虽然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文人那里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他们一般不肯轻易和直率地向人们承认这种显得不太有出息的心理变化),但从某些偶露真情的片言只语中,我们却还能见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清人沈谦在其短短的《填词杂说》中就曾两次谈到读词对他产生的“移情”作用:

一是说读了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句后，惆怅迷离，不能自主；二是说自己某次独宿旅店，读了柳永那首极言孤眠之苦的“每到秋来”（《爪茉莉》）词后，深觉它“能移我情”。再如，另一位清人江顺诒则说：“余性刚而词贵柔，余性直而词贵曲，余性拙而词贵巧……余性浅率而词贵蕴蓄，学词冀以移我性也。”（《愿为明镜室词稿序》）。请看他的欲以读词来修补其心理性格的某些不足而使之朝柔、曲、巧和含蓄蕴藉的方向发展，我们就不难感知唐宋词对读者的心理影响，大体确是指向“阴柔”一路的。而因古代读书人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基本是儒家经典和诗文作品那一套“传道”、“授业”、“解惑”的男式教育，所以从完整的人性出发，实际早就产生了某种“阴阳失调”的缺憾感。现今一旦得遇唐宋词这样一位温柔美丽的“女教师”，他们当然就会倍感亲切和欣喜。这就难怪词体一登唐宋文坛，便立即受到了当时雅、俗两大读者群的热烈欢迎；而即使在唐宋以后直至现当代，唐宋词仍以其主体上的女性化文学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当然，正如前述，词在思想观念方面给予他们的直接影响或许比不上诗文和小说戏剧那样深刻与明显，但它对读者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气质却起着一种相当微妙而持久的潜移默化作用。对此，丰子恺先生的一段读书体会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在《谈自己的画》一文中曾说：

欢喜读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书，欢喜谈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话，可说是我的一种习性。我从小不欢喜科学而欢喜文艺。为的是我所见的科学的书，所谈的大都是科学的枝节问题，离人生根本很远；而我所见的文艺书，即使最普通的《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也处处含有接触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我读了“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便会设身处地做了思念故园的人，或江楼相忆者之一人，而无端地兴起离愁。读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便会想起过去的许多的春花秋月，而无端地兴起惆怅……

小小年纪，本应无忧少虑，然而只因读了几本唐诗宋词，心头却“无端”地兴起了种种莫名的人生惆怅，这就足可证明古典文学（特别是以写愁情和柔情为主的婉约词）对于年轻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气质，具有着多么深的感染作用了。而再证之当今的流行歌曲，也曾以它缠绵悱恻的情调和轻靡柔艳的风格培养出了一大批“发烧友”与“追星族”，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一代青年人之精神面貌。那么我们对于作为唐宋时代之流行歌曲的唐宋词极能“动摇人心”的影响力，也就不难由此而想见。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很可仿效梁启超论旧小说的话来说唐宋词对读者的影响：吾国青年男女卿卿我我、一往情深的恋情情愫何自而



来乎?吾国文人淑女多愁善感、嗟离伤别之心理气质何自而来乎?吾国读者“以艳为美”、“以柔为爱”的审美心理何自而来乎?——它们很大程度上就是得自于唐宋词(婉约词)的熏陶。

以上,我们由唐宋词之身影不时在当代生活中闪现谈起,进而论析了它对读者的深层心理影响,由此证明唐宋词的确是一种至今犹在产生“活性效应”的古典文学。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应该如何来解释唐宋词虽“古”而不“老”的奥秘?或者换句话说,唐宋词究竟是靠什么来打动人心和吸引读者的?它之所以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之原因主要又在哪里?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唐宋词中贮存着十分丰厚而又能贯通古今的人生意蕴,而这人生意蕴就该是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

二

现在,再让我们接过前引丰子恺的话头继续述说。从他的读书体会中我们大可明白:对于不少读者来说,古典诗词之所以能深深吸引他们,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中“处处含有接触人生根本(问题)而耐人回味的字句”,从而能够激活读者自身的情思和联想。因此这段十分质朴而又真切的自述,实际却揭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道理:古典诗词的“活性效应”,其本源主要在于它们所贮存的有关人生诸种问题的思想底蕴。

平心而论,广大读者之所以喜读古典诗词,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于其艺术美感的赞赏和迷恋。确实,古典诗词的艺术美感是光彩照人、美不胜收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是不可超越和无法复制的,因此它们同样也是唐宋词“生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是相比之下,则古典诗词所贮存的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底蕴,就更是一种能直接对读者心理产生“活性效应”的首要 and 主要的活性因素。由于古人和今人人生状况的相似与相续、今人和古人在心理气质方面的大致不变与一脉相承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绵延沉积,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就能持久地激活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情思,不断地产生“活性效应”。对此,且作如下分析:

首先应该看到,古今的人生状况虽因时代环境的变易而产生出不小的差异,但从其根本内容来说,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和不断得到“复制”的。例如,从个人的物质生活而言,无论哪个朝代的人,其实都在为衣、食、住、行而奔忙,分解到最后,也不外是饮食男女、吃喝拉撒睡。再从生活遭遇和人生道路来看,各人的具体情况虽有千差万别,但概括来说,他们都要面对生、老、病、死的人生大问题,

也都会经历诸如荣辱是非、悲欢离合的人生遭遇。由此而来,古人和今人在处置这类相似的人生课题时,也就会产生出异代而同貌的情志与心态。例如,面对人生短促这一严峻的现实,他们都会感叹光阴之易迁、青春之难驻,从而思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努力去善待今生。又如,任谁都难逃生活的压力,不免会陷入感情危机或人生逆境之中,这时他们就都会勉力寻觅解决烦恼的良方,皈依某种人生哲学。若再说得具体一些,则不论是智者还是愚者,也不论是在上的达官贵人还是在下的平民百姓,他们一生中总要碰到诸如下列这些人生问题:读书、求职、婚姻、家庭、沉浮、迁徙、穷通、得失,乃至休闲娱乐、退休养身……虽然各个时代和每位个人的情况并不相同,但正像每天都要迎接太阳的升起那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却无一例外地必须面对上述几乎是“永恒”的人生课题并产生大致相似的感情活动。而在这两方面,早于我们千百年的唐宋词人就堪称是现当代人的一群“先行者”。苏轼曾有诗曰:“崎岖世味尝应遍”(《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唐宋词(以及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记录唐宋词人如何体验人生以及如何处置各种人生问题的“心灵文献”和“经验总结”。这样一部形象化的“人生百科全书”,怎能不激发起后代读者的心灵共振和感情共鸣?

其次应该看到,古今时代的人们尽管在穿着打扮、言语举止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但在心理气质方面却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道理相当简单:既然他们同样生息在华夏大地之上,既然他们同样用筷子进食这块土地上长出的黍稷稻麦,且仍使用着老祖宗所传下的同一种方块汉字,那么要说他们的心理气质会产生出很大的变易,是很难说得通的。一首有名的流行歌曲,其中有两句是这样说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据此可知,同是黄皮肤和黑眼珠的中国人,则不论他们是身在大陆还是身在海外,也不论他们是生活在古代还是生活在现代,基本都拥有着同一类型的“中国心”。而在这“中国心”中,自然也包含着心理气质方面的内容。举例来讲,千百年来中国多情文人,大多数都会见落花而伤春,闻雁声而悲秋,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感情行为就表明他们共同怀有着多愁而善感的气质。而更妙的是,年龄尚幼、涉世未深的少年丰子恺,一读到某些古典诗词,竟也会漾起莫名的人生哀愁,这就更足以说明中国人在心理气质的多愁善感方面,确是古今相似和一脉相承的。而因其心理气质的一致性,加上又面对着本质相同的人生问题,古人在其诗文作品中所抒写的种种人生感慨,当然就会对后代读者产生出撩拨心弦的“活性效应”。例如,杜牧登齐山,联想到《晏子春秋》所载齐景公登牛山而泣涕的故事,不禁浩叹:“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九日齐山登高》)这句“古往今来只如此”,以及晏几道所



说的“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①,就相当深刻地阐说了这样一个道理:古典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感动后人,其原因之一即在于前代作者和后代读者之间存在着“古今不易”、基本相似的心理气质。

再次,古典诗词能对后人产生“活性效应”,还与文化心理的绵延和沉积有关。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所以前代人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就会变成一种“传统”,代代相续地绵延在后代人的心中。举个极为常见的例子来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然而时至当代,它却仍然未曾断根,不少地方所发生的丢弃甚至扼杀女婴的事实就证明了它在某些国人脑中简直是根深蒂固。再如,古人对其后代抱有“望子成龙”、“光耀门庭”的强烈企盼,而20世纪末的中国人却也无不千方百计要把子女送进名牌学校,这就足以说明某些传统观念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由此可证,包括思想观念、民风民俗、生活习惯、审美情趣等等在内的文化心理,确实存在着由古至今不断绵延和积淀的事实。而前代的文学作品,就正充当了沉积和承传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载体。所以,当后代读者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阅读其中特别擅长于抒情写心的唐宋词时,他们就会与古人贮存在其作品中的文化心理产生“似曾相识”的稔熟感和“情投意合”的默契感,从而激起了自身的感情涟漪。举例来讲,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月亮就怀有某种特殊的感情:既感亲切,又感神秘;既感温馨,又感清冷;既盼望它的早日变圆,又忧惧它的由圆变残……总之,一见到月亮,就往往在心中涌发盈亏离合的人生惆怅。这种文化心理和感情体验,同样绵延在现代人心。故当他们读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时,心中也会涌起和张若虚一样的迷惘;当他们在与恋人分离或聚首时见到一轮圆月或一钩残月时,也会发出和吕本中一样的怨嗟:“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到团圆是几时?”(《采桑子》)所以尽管苏轼已经远离了我们800多年,但人们(特别是与亲人不能团聚的离人)面对中秋的皓月,却仍然会和他一样升腾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人生遗憾,也同样会发出对亲人的衷心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古典诗词之所以能激活读者之情思,使他们产生“古人先得我心”的钦佩与感激,分明就与它们所“释放”出的文化心理能与读者心中沉积的传统心理一拍即合有关。

所以综观以上情况可知,唐宋词人在其词中所记录和贮存的人生意蕴,绝不

① 金启华等:《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是一大堆冷冰冰的思想资料,而是一大团散发着光和热的文化资源,读者只要稍具人生阅历和文化悟性,就定能接受其“辐射”而引发相应的“心理感应”。因此归根到底,词之所以能对后世读者产生“活性效应”,之所以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其本源就主要在于它所贮存的十分丰厚而又贯通古今的人生意蕴。当然除此以外,词的绚丽多姿的艺术美感也是吸引读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相比之下,后者毕竟属于第二位的因素。这是因为,人们之欣赏词的优美“词境”,就必定是与它们所深裹着的“词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词心”就是那有关于人生问题的思想底蕴)。尽管有些读者之喜欢读词在一开始时或许仅被其艺术美感所深深吸引,但最终使他们反复吟咏和回味无穷的,却依然是那贯通古今的人生意蕴。何况,“石韞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陆机《文赋》语),正是由于人生意蕴像珠玉那样韞怀其中,词的艺术天地才会显得分外的山晖川媚。而若抽去了这层丰厚生动的思想底蕴,则再好的艺术美感也会像橱窗里的时装模特那样徒具华美的外表而缺乏真实灵魂。所以说到最后:唐宋词的“第一生命力”就该是它所贮存的人生意蕴。

三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上述道理,我们还可从后世读者对唐宋词的接受情况着眼,进一步论证“唐宋词之‘第一生命力’在于其贮存的人生意蕴”的题旨。以现当代读者为例,他们之所以会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不时捧读唐宋词选,除开满足审美需求之外,主要就在于利用词中的人生意蕴,以求得自身的心理平衡和获取精神方面的滋补。他们对词的喜爱和接受,分明就体现着“各取所需”和“古为今用”的实用性倾向。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尤可看清:

第一是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分别偏嗜不同类型词篇中所贮存的不同人生意蕴,从而各取所需地获得感情的宣泄和满足。对此且让我们先引郑板桥的三句话作佐证,他在《词钞自序》中曾说:“少年冶游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苏、辛,老年淡忘学刘、蒋。”这虽然仅是他个人的学词经验,但却概括了许多读者读词的共同偏嗜:青少年时代,喜读秦观、柳永的恋情词;中年时代,喜读苏轼、辛弃疾的感慨之作;而到老年,则又爱读刘克庄、蒋捷的“看穿”、“出世”之词。这种人随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阅读兴趣之改变,主要非关审美方面的因素,而恰与其人生轨迹同步。换句话说,人在不同的年龄段自会遭逢不同的人生问题和产生不同的人生感触,因此他们就十分自然地会向相应的词篇靠拢,“求其友声”地去寻求感情的共鸣。这就又一次证明了词之“活性效应”产生的基础即在于它们贮存的